

知和行书局

荐阅书单

海航大厦店
华夏银行店
海航万绿园店
南方出版社店
国秀城店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83岁的邵燕祥仍在继续他的回忆录写作。从《沉船》《人生败笔》到《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邵燕祥一直在文字中坚持着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自己的审视。这本新书《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是《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的前传，所写的时段自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开始，至一九五八年为止，是那段历史中一位亲历者与幸存者的心灵史。

邵燕祥的文字能够直面血泪浸透的历史——不是辩诬，不是自恋，更不是怀旧。他对自己的写作有着高度的使命感，在序言中他说：“历经忧患的生还者也都逐渐老去，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写出来，献给健在者和一切敢于直面历史的同代人，只有他们有权利来审查这一份历史的见证。”



作者：邵燕祥
版本：作家出版社
2016年7月

《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

14世纪的欧洲包含了两个相互冲突的图景:这是一个十字军、大教堂和骑士制度的时代,也是一个堕入混乱与精神痛苦的世界。黑死病之外,这个时代还经受了战争、苛捐杂税、强盗窃贼、腐败政府、叛乱暴动和教会分裂等灾祸。除这些历史大事件外,塔奇曼还触摸到了中世纪家庭生活的质感,以独特的写法让读者进入这段历史。这本书的写法属于“叙述性历史”,即在严格遵照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像写小说一样创作历史作品。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历史学家塔奇曼穿越时空,通过凿穿14世纪斑驳的墙壁,在洞中映射的中世纪的幽光里,为我们呈现出另一个世界。



作者：(美)巴巴拉·H·塔奇曼
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2016年9月

《光棍危机: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

男女比例悬殊、农村“光棍危机”，这是国人早已熟知的议题，也同样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光棍危机》的作者将这一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与环境安全研究结合起来，谈论“针对女性的暴力”和“社会内部乃至社会之间的暴力”之间的关系。一个有太多男人的社会会发生什么？两位作者认为，从历史上看，男性对女性的高比例往往是国内和国际暴力的触发因素。多数暴力犯罪是由缺乏稳定社会关系的年轻未婚男性实施的。虽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这些过剩的男人经常在社会普遍存在的暴力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认为这种过剩的男性人口，在亚洲最大的国家威胁着国内稳定与国际安全。



作者：(美)瓦莱丽·赫德森
(英)安德莉亚·邓波尔
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8月

《落不定的尘埃》：
无声草木的藏地哲思

■ 高中梅

阿来凭借《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时，年仅41岁，是茅盾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有人预言阿来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有人认为阿来可能是昙花一现。10多年过去了，阿来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未知数，但他绝没有昙花一现，相继推出了《空山》《格萨尔王》《瞻对》等艺术上不断创新的作品。

阿来的小说深邃而厚重，散文却写得灵动活泼。《落不定的尘埃》是阿来的一本生活哲思散文，书中分“大地的咏叹”“病榻杂记”“文学的教义”三辑。这里，阿来具有多重的身份，他是一个作家，一个藏族人，一个环保主义者，一个摄影爱好者。此刻，阿来以一个当局者的身份，静观着藏地的风情。那些无声的，却又有形有色的自然草木，是他最为魂牵梦绕的精灵。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使其用心观察体悟自然生命的状态，文人的雅趣使其能将所察所想所思，付诸文字带给读者，竭尽展示独具慧眼的藏地哲思。

阿来游走在藏地这块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对边地文化进行了追思与展望。他带我们走进藏地神秘的地带，写出了藏地的慢慢变化：和平给大小金川村落的最大的变化就显现在窗户上，过去枪眼般的窗户越来越轩敞。这一带村落自乾隆年间史无前例的那场大战以后，被汉文化同化的趋

势越来越强。所以，那窗户也多半是照了官方修建的乡政府窗户的样子，一个长方形中分出双扇的窗门，每只窗门装上三格玻璃。阿来把这样的细节呈现给读者，让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阿来藏地的成长经历使其被藏族文化熏陶，具有了强烈的禅思精神。城市街边常见的梅兰李桂，在阿来那里，超越了“生活一角”的常态感，演化出了生命最本真的禅意。他从普通花草过渡于一城的花草，也多了些这个城市的人情滋味。这种味道来自于阿来对这座城市的喜爱，也因为喜爱，而不停地反思与叹息。比如，阿来感叹，虽为蓉城，可是城里的海棠数量却远远多于芙蓉的数量，而这些枝干虬曲的海棠树却都沉默着。对此，铁凝曾评价：“阿来都在专注于这样的无名花草，发现它们短暂而异乎寻常的美丽。作为旁观者的我，那一刻，心生敬意又满怀感动。”

中国人心中的故乡是一个怎样的存在？阿来在《道德的还是理想的》一文中写到，我们文字里的故乡，不是经过反思的环境，而是一种胆怯的想象所造就的虚构的图景。我们虚构了故乡，其实也就是拒绝了一种真实的记忆，拒绝真实的记忆，就等于失去记忆。而失忆症也从一个小小的故乡，扩展到民族，扩展到国家历史，使我们的文化成为一种虚伪的文化。当我们



《落不定的尘埃》
作者：阿来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时间：2016年9月

放弃了对故乡真实存在的理性关照与反思，久而久之，我们也就整体性地失去了对文化与历史，对当下现实的反思的能力，读来让人深省。

现实和历史总是有关联的，阿来的作品一直在现实和历史之间往返穿梭。《尘埃落定》写的是上世纪前50年，《空山》从上世纪50年代写起，“写完之后，觉得更遥远的历史和现实一定有某种关联”就写了《格萨尔王》。《落不定的尘埃》写的是一个容易被世人误解的藏地、一个交织着现实与历史传说的藏地，一个历经传奇沧桑而平静的藏地。这里还有阿来的心灵对话、文学思想和主张，而那些序言和讲演，既包含了理性的文学思想，又是优美的充满诗意的散文。特别的是，阿来谈到了音乐于他文学人生的意义。

阿来曾说，作家有责任去观察和书写那些别人可能不怎么关心的事情。阿来的文字，有历史，有人文，有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浸润；无论是游记，还是赏花，或是读书札记，阿来从不缺乏的是一种对生活对人类的反思，和一种对大自然的亲近。读阿来，能洗涤心灵的尘埃，更能带来沉思后的平静。☞

《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
历史背后隐匿的真理

■ 叶雷

历史是一面镜子。然而，在历史发生的那一刻，它就被打碎了。要发挥历史的“镜子”功能，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捡拾散落在地下的历史碎片，尽可能地将它复原。历史这面镜子，需要从档案、资料等“碎片”中得出“大叙事”，更需要存在于亲历者、当事人、目击者记忆之中的“小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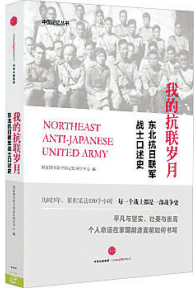
在“大叙事”的层面，“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对日作战、条件最艰苦、历时最长的一支抗日武装，经历了最为漫长、最为悲壮的十四年抗日斗争，在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光荣历史不可分的一部分。东北抗联是中华民族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先锋军和宣传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实践，是苏军进军东北的先遣军，是中国共产党东北根据地的奠基人。东北抗联所体现出的爱国精神和不屈精神，永不褪色，永不过时，是激励中华民族振兴的不竭动力。

然而，从抗日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到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名称变换的背后是什么？东北抗联14年白山黑水游击战，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作为我党建军史上的三大艰苦斗争之一，究竟苦到什么

程度？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中、李兆麟等著名英雄，抗战的细节如何？著名英雄背后还有怎样的无名英雄？他们的个人命运在家国前途面前是如何书写的？……每一个战士都是一部战争史，他们的平凡与坚实、壮美与崇高，是对当时的参照，也是对未来的预言，更是对中华儿女永远的感召。

《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一书，就是通过20位健在的东北抗联战士、家属或后代、亲历者、研究者原汁原味的“小叙事”，让有血有肉的事实来说话，再现了东北抗联历史的真实鲜活与生动丰满。这些口述者，包括从朝鲜逃难而来的战士李在德、不想当亡国奴从伪军起义而来的战士陆保平、17岁就加入抗联的战士潘兆会、当时的地下交通员赵三生、苏联通讯连里发密电的孟宪德、没上过学的苏军翻译周淑玲、“八女投江”的见证人胡真一、立大功的“放牛娃”张正恩……以及杨靖宇、冯仲云、赵尚志等的后人。

历史是有温度的，更是有温情的。尽管《我的抗联岁月》属于“小叙事”，但却不是各种事件的杂乱堆砌，而是以“抗联岁月”为本，以熟悉的历史活动为开端，在口述者娓娓道来的片断事件中，逐步将读者引入熟悉事



《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
编者：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
出版：中信出版集团
时间：2016年9月

件的“陌生化”境界。口述者的经历、内在世界和经验意义，不仅会唤起我们的同感，在影响和震撼我们心灵的同时，又牵引着我们去寻找那些“陌生化”了的熟悉事件背后隐匿的真理。这种通过意义串缀起来的“小叙事”，呈现的理性和逻辑，对灵魂的激荡，远比“大叙事”直接揭示的形式、规则和规律，要深刻得多。

比如，在李在德口述的士兵找烟土中，我们或可估摸为何50余万的东北义勇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大部分伤亡散落；在每一位口述者都有关于共产党员的描述中，我们就可理解最多时有3万余人最少时只有2000余人的东北抗联为何能坚持14年；在他们关于“密营”的描述中，我们不仅震撼于抗联的艰难与创举，也会更清楚日伪大规模“归屯并村”的目的；在冯忆罗说“我的名字是为了纪念罗登贤同志”时，我们不可能不为那种特别的战友情深震撼。☞